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外交的 理论探索^{*}

赵可金 陈碧琳

〔内容提要〕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它贯穿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外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指导思想上,从最初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实行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对外开放,最后发展为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增强国际话语权。在外交理念上,经历了从依靠文化到为了文化的转型。在工作方针上,实现了从文化交流到文化自信的转变。在中外文化交流如火如荼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外交必须坚定信念,在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他国做法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之路,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理论。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文化外交 中国特色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6) 01-0086-07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6.01.013

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外交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上不承认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经济上封锁,军事上遏制。为了打破这种孤立和封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直接领导下,提出了“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官民并举”、“求同存异”等思想,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思路,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众多国家建立起了外交关系,突破了外交封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全国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需要,对外文化交流成为改革开放伟大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都有大量关于重视文化外交工作的重要论述。比如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超越意识形态限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及“重视文化领导权”等思想,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和而不同”思想,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和“外交为民”等思想,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外交的发展和壮大,文化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文化外交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载体,指导思想、外交理念、工作方针日益完善,步

^{*} 本文系教育部中美人文交流基地项目“地方政府与中美人文交流”的阶段性成果。

入了制度化发展的轨道。

一、指导思想:从阶级斗争到国际话语权

外交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活动,任何国家之所以重视文化外交,总有其独特的政治考虑。比如,美国的文化外交核心是为了输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在海外传播价值观。法国开展文化外交则通过法语教学、文化产业、社会交流和国际广播等渠道,欲塑造法兰西的伟大和神圣,推广法语和法国文化,进而确立法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和政治影响力。韩国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传播活动,核心是把韩国塑造为一个“中等力量国家”的良好形象,以区别朝鲜给世界造成的负面国际形象。可见,每一个国家在开展文化外交时,均基于独特的政治考虑,反映着特定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意图。理解一国的文化外交,必须将其置于该国政治棋局的全局中,才能真正把握其指导思想和战略预期。

从中国政治棋局的整体视野出发,新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格局。首先,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之中,始终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大压力,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无法回避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和竞争,如何妥善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必须将维护和巩固中国的和平发展作为中国首要的战略任务,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此外,中国是一个天然的地缘政治大国,有着辽阔的国土面积和海洋疆域,拥有大规模的社会人口,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外交也不可避免承担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国际责任,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在全球政治经济棋局中,中国既是一个弱国,又是一个强国;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存在着难得的机遇。如何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为中国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

和发展航向,是攸关中国战略全局的重要课题,也是理解中国文化外交的根本所在。

从中国面临的国际棋局出发,按照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确定的根本任务划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外交在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以阶级斗争、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为重心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阶级斗争为重心(1949—1978年)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的特殊经历赋予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分为二”的哲学思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分清敌我友,强调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早年就强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相继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导理论。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之所以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是国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说“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②他还指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③直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还沿用这种国际统战思维。因此,中国所从事的一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从根本上都是国际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一种特殊的实现形式,是通过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和军事战线一样的“文化战线”。“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④,其根本落脚点是争取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第二阶段:注重提高文化软实力(1978—2012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根据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新要求,及时调整了文化外交的工作重点,开辟了文化外交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各项工作

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一思想指引中国外交开始由“经济发展为外交服务”向“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转变。1983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⑤,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⑥,强调“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⑦。在改革开放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对外文化关系和交流范围逐步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对外文化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新指导思想。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建设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⑧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强调“要围绕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⑨。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时指出“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文化。”^⑩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明确提出了“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⑪的目标。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从战略高度对文化外交及其目标进行了系统阐述,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中国文化外交发展的方向,把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文化外交的指导思想。

第三阶段: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2013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看待,并把中华文化

国际影响力提到显要位置,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信。^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重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越来越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逐渐成为新常态下中国文化外交的指导思想。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⑬。习近平的这一论断是从党和国家政治大局的高度对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作出的准确定位,集中回答了文化外交的核心问题就是提升中华文化和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问题。随后,在2013年12月30日举行的第十二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⑭,而“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⑮。在具体对外文化交流上,习近平强调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尤其是“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⑯。2015年6月30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之际,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外版在新起点上总结经验、发挥优势、锐意创新,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海内外华人华侨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不难看出,提升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各方面对外文化交流的核心。

二、外交理念:从依靠文化到为了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外交

思想指导下,中外文化交流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政府对待文化外交的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外交的理念逐步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依靠对外文化交流服务中国外交向依靠外交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转变,中国文化外交的理念更全面、更成熟、更完善,对外文化交流不仅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成为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抓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打破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中国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主要强调依靠文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文化外交发挥了“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作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建立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与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开辟中国外交局面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外文化交流,强调对外文化交流是国家整体外交工作的一部分,被视为“宣传文化战线”,“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对外文化交流必须同党和国家的对外总政策一致,并为其服务。1949年6月,中国向匈牙利派出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毛泽东指示他们出去要宣传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要加强和各国青年的友谊,要向苏联学习。作为国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长,周恩来始终把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纳入新中国外交的总体格局之中,认为文化交流是其中的重要一翼,将文化代表团看作是中国的文化使节,出国前往往亲自向他们介绍东道国的情况,阐释中国的政策,提醒注意的事项。他说“我们的外交也要靠文化和贸易,这是件重要任务。”^①他还提出“将来可以多唱西方歌曲,亚非拉的也要唱,这也是国际运动的一种任务。”^②在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发言中,周恩来说“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作为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方法,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在这方面吝惜我们的力量。”^③建国后,尽管中国与许多国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与这

些国家的文化联系却十分热络,京剧、音乐、舞蹈、杂技、展览等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交流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角色。周恩来在1955年10月20日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将文化团体称之为“政治和文化结合的队伍,不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队伍,是文化使节”。他说,“做外交工作是殿后”,而担负文化使节责任的文化工作者,则是“国际活动的先锋”。^④显然,在建国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对外文化交流是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的手段和工具,不仅在与像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外交中产生了“锦上添花”的效果,而且在与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外交中也起到了“雪中送炭”的功效。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全国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需要,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事业,丰富国内多样化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写入;1983年,邓小平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⑤,使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有了明确的法理基础和政策依据。当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服务国家外交政策需要依然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目标之一,诚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只有两国政府间的合作,而没有民间交往,两国关系是不可能有着扎实的基础的。”^⑥不过,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心已经从服务国家外交政策向提升中国文化竞争力转变。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⑦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⑧,强调“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⑩,为此,新时期

的对外文化交流不仅要为国家外交政策服务,更要为国家文化建设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21世纪以来,为了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对国际文化交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理念,认为“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增强国家亲和力和影响力,是全面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之举。”^{②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强调文明因交流而丰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也成为中国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中国文化外交在服务中华文化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上越来越自觉主动。^{②8}相比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文化外交的理念更加全面,不仅强调文化服务外交,也重视外交服务文化,文化系统与外交系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格局日益巩固,文化与政治、经济一起构成了中国外交工作的三大支柱。

三、工作方针:从文化交流到文化自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着眼于深化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中国外交政策方针和基本任务不同,决定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具体思路、工作方针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中国领导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对不同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具体思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经历了从文化交流到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自信的转变。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中,站在民族责任、人民责任和党的责任高度,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外交总方针,为文化外交指明了发展的方向。^{②9}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化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基本工作方针。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高度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工作。毛泽东在1945年就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③0}他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③1}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建设形势,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③2}建国后,毛泽东更是强调文化建设事业,认为中国理应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③3}。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上,毛泽东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既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于一切外来的文化要有批判地学习,也反对盲目排外,认为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是一种平等的文化交流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洋为中用”方针的基础上,更强调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指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③4}。邓小平十分重视文化艺术在深化国家间理解和信任的作用,认为“艺术是使各国人民增进了解、消除隔阂的最好的办法”^{③5},指出“中国现代的东西少,古代的东西多,西安代表古,长城也是代表古,但不管古还是今,对增进两国人民交往、增加了解都是重要的”^{③6}。可见,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成为中国文化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他认为“两

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⑤在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特点问题上,江泽民强调在文化交流中要相互尊重和对话交流,认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只有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相促进,才能创造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世界”^⑥。他提出“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加深了解”,“不同文明应该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互之间应提倡宽容而不歧视,交流而不排斥,对话而不对抗,共处而不冲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个世界应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对话,少一些傲慢与偏见,多一些交流和沟通”^⑦。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成为新时期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基本方针。

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在继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文化外交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阐释,把文化外交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⑧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文化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⑨,并且“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⑩。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不仅明确提出了文化外交的概念,而且还将其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战略工具,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指导新时期文化外交的工作方针。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和壮大,特别是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

更好地了解中国”,并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为“中国梦”与“美国梦”、“非洲梦”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认为“文化因交流而丰富、心灵因交流而沟通、友谊因交流而加深”,文化外交的理论自觉性和战略地位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文化外交不仅成为中国外交工作中的一个亮点,也成为中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访问时强调“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⑪在具体文化外交实施过程中,习近平强调各国情况不同,道路不同,“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才知道”,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特别是明确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三个自信”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在文化外交方面的高度自信。所有这一切,都为新时期开展文化外交规定了具体的工作方针。

四、小结

文化交流是沟通国家与国家之间理解的桥梁和纽带。围绕着为什么要开展文化外交、开展什么样的文化外交以及怎样开展文化外交,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出发,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认为文化外交是阶级斗争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强调依靠文化服务外交,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文化交流,扮演“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把文化交流作为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文化外交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工具,不仅为中国总体外交服务,更为繁荣国内文化事业服务。冷战结束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大力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使之成为中国软实力战略的重要支柱,文化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三支柱之一。新世纪新阶段,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文化外交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依托,开辟了中国特色文化外交的新的广阔空间。党的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文化外交和人文交流,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强调“中国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和“世界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为文化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人文交流以更神圣的使命。在中外文化交流如火如荼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外交必须坚定信念,在总结历史经验、借鉴他国做法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之路,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理论。

注释:

①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第246页。

④⑪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第706—707页。

⑤⑥⑦⑪⑫⑭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页,第35页,第44页,第43页,第63页,第70页。

⑧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⑨ 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载于《求是》2012年第1期。

⑩⑪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载于2009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⑫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于2012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⑬⑭⑮⑯⑲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第162页,第163页,第161—162页,第5页。

⑰⑱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第184页。

⑲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发言》,载于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⑳ 1955年10月20日,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9—510页。

㉓㉔㉕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4年版第200页,第477页,第680页。

㉔ 江泽民《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大力加强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1993年12月18日),参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页。

㉕ 江泽民《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7年5月26日),参见《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㉖㉗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8页,第522—523页。

㉗ 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2008年1月23日《人民日报》。

㉘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9—105页。

㉙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㉚ 毛泽东《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1949年7月1日),参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130页。

㉛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㉜ 江泽民《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参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页。

㉝ 《江泽民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461、613页。

㉞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3年11月10日),参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52页。

㉟ 《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举行》,载于2004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㊱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㊲ 《“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载于201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责任编辑:文心]